昆曲小识

孙 郁

我来京工作后，才第一次在剧院接触了昆曲。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记得是在中山公园礼堂，洪雪飞演的折子戏《断桥》，缓缓的旋律中，音旨微婉，好像被引入古人的画中。此前在电影里看过一次昆剧《十五贯》，印象深的是故事，而舞与曲，都不太懂，只觉得是南方人的雅调，这类旧戏，是古风的一种，要欣赏它的美，需要有个慢慢的适应过程。

我们这代人，多是因为看了电影《十五贯》才开始知道昆曲艺术的。说起《十五贯》，不能不提黄源先生。他对于此剧的推广，功莫大焉。我和黄先生有过一点接触，但对于他的了解很浅。1991 年筹备鲁迅纪念会，黄源先生从杭州来京，忙于会务的我，趁机向他请教过几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黄源被视为老派人物，青年人与他有点隔膜。那次会议后，和他的交往很少。最初对于他的了解，十分模糊，只知道除了与鲁迅关系较好外，最大的功绩是在五十年代救活了昆曲。黄先生去世后，我很后悔没有和他多一些接触，曾到杭州见到了他的老伴巴一熔，想为鲁迅博物馆征集先生的遗稿。在这个过程中，看了许多旧物，先生的生平才清楚起来。

我的同事张一帆来自杭州，有一次聊起昆曲，席间谈到了黄源，没想到他对老先生解之很深。张一帆是戏剧研究专家，深味艺林掌故，仿佛是为戏剧而生的人。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大概也是浑身有戏的缘故。近日读到他的新作《一出戏怎样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十五贯〉改编演出始末》，忽让我想起诸多往事，过去一些模糊的片段渐渐清晰了。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围绕《十五贯》诞生的前前后后，写活了梨园里的一段历史。此书关于黄源的部分，颇为难得，彼时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生态，都在变化，在缝隙中，黄源嗅出了时代的另一种气味，看到了戏剧改革的可能，便做了件惊动文坛的大事。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到了民国期间，就已经衰微，张中行《韩世昌》一文，就描写过当年北平昆剧演出过程的清冷之景。喜欢这个剧种的，总还是少数。新文学中人，欣赏昆曲的人有多位，叶圣陶、顾随都对于这古老的艺术很熟悉，拍曲之乐，与文字之趣是相互交织着的。这种趣味也说明，士大夫的遗风与大众之心，总有些距离。

不过，民间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看张一帆的书才知道，在知识群落之外，流浪中的艺术家曾以顽强的方式支撑着昆曲。民国时，朱国梁与国风社在风雨飘摇之日，起旧音于新时，将昆腔活了起来。齐如山曾叹昆曲的衰落与创新不够有关，但我们看朱国梁与国风社的选择，是有烟火气的，且又保持了古老艺术的基本品质。虽然“跑码头”中消耗了诸多精力，但也深知百姓需要什么，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在动荡年代还能不忘责任，歌舞中也多感时忧世之思。昆曲本是雅的艺术，但朱国梁却使其再现了活力，诗文妙意与世间冷暖悉存，难怪黄源第一次看到《十五贯》便被吸引，在古老的笛声里真能听出今人的心跳，那是让人感动的。

1950 年，黄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五年后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他开始注意昆剧《十五贯》，是在 1955 年年底。作为鲁迅的学生，不仅译过大量域外文学作品，其实对于国故也颇多趣味。他知道，江南丰富的戏剧遗产，可利用者多多，以何种方式激活旧的艺术，是有学问的。张一帆梳理《十五贯》的出现与昆剧的复活，不仅还原了一段历史，也礼赞了黄源等人的推陈出新的精神，其中史料中的风景不乏美学亮点。从剧本演变过程，和大众接受史，可以看出经典传播的不易。黄源为推出昆剧新作不遗余力，也由于他，一个地方院团的作品，遂红遍了天下。

先前的昆曲是士大夫的梦幻，有点像江南园林，石径缠风中，水木泛光。顺着那些形影，当可感受到浮世之彩，真幻之声。吴梅先生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了昆曲的要义，他的弟子韩世昌将曲与剧完美的结合，出出进进中，复活了某些音律。这期间有许多人物值得感念，如俞振飞先生就在创作中，风情种种，沿月踏风中，再现了古诗境界。他因为《十五贯》的成功而对昆曲的发展有了信心，在后来的普及与提高中，给艺林带来不少美谈。与俞振飞这样的艺术家不同，近来有的作家对于昆曲也颇多感情，白先勇倾力打造《牡丹亭》，有别样的寄托，小说家借着丝竹之音，追溯着故国之情，意义已经溢出了梨园，复兴旧戏的情思中，保留了艺林的一湾清纯。

一个古老剧种能因一出剧而复活，在戏剧史上可谓佳话。张一帆认为要从天时与地利、人和中看艺术在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是对的。入此径者，当有悟道之乐。五四之后，新文化冲击了某些传统，许多老艺术渐渐退出舞台。但一些真正的新文化人，对于老的遗存，不都是无视的。田汉话剧写作中的京剧元素，老舍对于戏曲形式的借用，曹禺笔下的梨园旧影，都颇有意味。而像郑振铎、阿英对于旧遗产的保护，都非彼时的遗老遗少可比。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以新文化精神，唤出被掩埋的世界里的精魂，也丰富了艺术的语境。新文学家与旧戏的关系，说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白先勇的选择，当不是最后的遗响，相信这条路上的人，总会不断的。

在新文学作家中，对于昆曲体味最深的，大概是俞平伯。俞先生是懂得曲学的，他关于昆曲的理解，也带有五四新文化人的视角，言及元曲与近代昆剧，都有贴心之论。先生之于昆曲，仿佛也像赏析古文，注重的是其间滋味。与黄源这种革命者比，文字过于安静。他既肯定《十五贯》的创新，但也有保留意见，以为有些删改伤了元气。在新旧之间，旧的成分要多一点。相比起来，俞平伯更欣赏俞振飞的气质，彼此的相知，从他的《〈振飞曲谱〉序》中可见一二。

但俞先生的自我吟哦，知音能有多少，确是一个问题。常看到一些文章谈及那代人的拍曲之趣，觉得是象牙塔的高贵，与人间苦乐渐远。细想一下，那些亭台与书房间的雅音普及起来殊难，昆曲的寂寞也是自然的。看了张一帆的研究，更喜欢的是朱国梁这样在苦水里泡过，在风中穿过的艺人，辗转于危难中人对于苍生有彻骨的体验，他们于古音得到元气，在现实里呼应了传统，身体的热度辐射到了广大的世间。《十五贯》这样的精品当年走红，仰仗的就是艺术家们的慧能，与执着的审美理想。朱国梁遇到黄源，乃一幸也。黄源深味了时代精神，助力激活了古老的遗产，亦一幸也。说到根本，他们都站在古今的连接点上 ，又在大众的一边，大众的土壤深，艺术之树就绿了。

老友记

——悼江迅

曹景行

新闻老兵也是多产作家江迅在香港突然离世，闻此噩耗心中顿感疼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算了算，我们是五十三年的朋友了。

五十三年前的 1968 年 8 月 20 日清早，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登上同一辆大巴，从此成为朋友。晚上我们到了皖南的上海市黄山茶林场，都分到了六连。同一个班住同一间宿舍，每天日晒雨淋一起干活，晚上在同一盏煤油灯旁看书写信。

半年后我们又一起被调去五七连队，同住一个茅草顶下，而且我俩还住上下铺，忘了谁睡上铺谁下铺。当然，那时谁也没想到多少年后我们会在香港又成为同事。

我们作为朋友超过半个世纪，老友记了，但我只是他无数朋友中的一个。江迅两岸三地朋友之多，恐怕无人可比。

他从安徽农场回上海后，在《文学报》工作多年，办报办刊闹得轰轰烈烈，结识了许多文化人。

1994 年他来到香港即进入《亚洲周刊》，我们成为一间办公室里的同事，我也逐渐领教到他内地人脉的厉害。从开始时的新闻采访发掘故事，到这些年办香港书展，都如此。

对内地这些朋友，他也真是诚心相待，累心劳力。二十多年里，不知有多少内地作家朋友来过香港，他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接待，甚至帮着购物。一些年岁较大的作家来香港，江迅还搀扶朋友上街，朋友转个身就会喊“江迅啊！”老作家看到一米八高个子的江迅就在自己身边，这才放心。

没过几年，江迅又认识好多台湾新朋友，从高信疆、李敖、陈文茜到星云法师。2017 年李敖患脑癌病倒，江迅特地从香港飞台北探视，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写了大篇文章。

江迅究竟有多少香港朋友，恐怕难以计数，从作家文化人到“三教九流”采访对象。他还花许多精力带出一群又一群大学刚毕业的新手，好些是从内地来香港读书的，江迅引着他们进入新闻和写作领域，走南闯北。江迅的去世，对他们打击甚重。其中一位给我发微信说：“我真的好难受好难受，江老师走得太突然太突然了，真的很不能接受……”

江迅很重义气，讲情分。一位茶林场五七连队老友得知他去世，数度泪流满面：“他是一个好大哥，52 年后的今天，得知江迅去世消息，还有那么多队友表达沉痛悼念之情，可见队友们是多么认可他的为人。”

《亚洲周刊》清洁工“群姐”已离职近一年，江迅在新书中专门写到她，两个多月前还同几位“小朋友”特地请她吃饭，送书。

江迅义薄云天，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有大小事情请他帮忙，他绝少说“不”。和朋友约好的饭叙，无论多忙他从不缺席，总是最早到，却常常将位置让给迟到的人；每年香港书展，他领军将朋友的文章结集出版，制造瞩目效应，却把焦点让给朋友。

江迅朋友多、工作忙不过来，让他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或许朋友太多了点，工作负担太重，让他累着了。五六年前他突发心梗倒地，幸而人就在医院就诊，急救抢回。为此不知多少朋友劝他悠着点，认真休息，都没用，这次病后他总算不再抽烟，却又喝更多咖啡。他无法停息搁笔，因为他是江迅。他去世前出刊的最新两期《亚洲周刊》，就有七篇报道是他采访编写的。现在，他终于安详地入睡了，永久地……

笔会

雨季 No.1（国画）柳立富

一树红枫 半篓蟹

方益昉

一叶知秋。昨日突然意识到，书斋窗外的北美红枫，开始变黄。今晨特意再瞧一眼，树冠面北的叶儿颜色加深，有些橙黄的意思了。或许在海风的日夜催化下，再过一阵都将变红。我通常羞于掰弄花草诗文，但口腹之欲被秋叶挑逗起来后，难免思忖，金秋何处大闸蟹？

往年每到这个时节，老友们便纷纷邀约，宠着我这个老上海去品蟹，既像怕我忘本，也带点向假老外炫耀的成分。其实，出于医食同源的专业信仰，我不但热衷本帮美味，还与各路酒肉厮混，也算干正事。否则，《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中，由我主笔的食材酒水章节，篇幅将近五万字符，无论如何也难以一边探源历史与科学的关联，一边融入个性化痕迹。

若遇我正好在沪，最接地气的品蟹路径，便是叫上滴滴直奔阳澄湖。众友与水乡相好多年，该去哪家酒肆驾轻就熟，但斯文一点的蟹聚，就比较费脑饶舌。精心邀约三五知己，款款潜入诸如周庄、锦溪、同里的农家小院，或讲究台面环境的，相约佘山、天马山、北竿山等，距市中心一小时车程的西郊别墅。主人将金毛蟹与词牌名连盘端出，不交诗文不掰蟹。文艺至此，确实不宜辜负盛情，酒足蟹饱后，倒也留下几句工整的，待日后用做文章标题。

也有脱不开身，人在长岛而非故里的年份，热情的好友，便设法将绑了防伪标记的名牌大闸蟹，空投到我落脚处。该厮入境美国海关，竟比游客还容易，只需我欣欣然驾车提货即可。眼下疫情改变生活，彻底打乱了食蟹节奏，均因直飞纽约的航班减少，费用剧增所致——放在疫情大流行前，只消算准了东航时刻表，周五大闸蟹浦东登机，周六恰好将活蹦乱跳的尤物，放进纽约的蒸笼，与沪上友人视频共享，一点不耽误事儿。

几十年前，刚到纽约那阵，因为嘴馋沪上蟹宴，也设法建起一套不错的，立足本地的解决方案。秋风乍起前夕，及时备妥大功率手电筒和长柄网兜，再去长岛海湾（Long Island Sound）的黄金海岸踩点，探寻出海堤坝长，晚间灯光亮等诸般有利捕捞北美蓝蟹的阵地。然后，在家静候晚上涨潮的汛期，在潮水高峰时段赶到现场，开始尽兴海捞，绝对比海钓高效。如果带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惊呼中享受收获，就更有气氛了。

这套新移民发明的解馋玩法，远比老纽约传授的传统海钓，即在蟹篓里放鸡大腿，顺手把蟹篓扔进大海，要主动爽快多了，只需十来分钟，竟有半篓收获。聪敏勤劳蔑视运气守成，完胜守笼待蟹的懒汉本事。蓝蟹的肉感，虽与微甜的大闸蟹有异，但丰满鲜美并无二致。关键是，在与北美蓝蟹的海面互动中，还直观地见识了科普书上描述的螃蟹生物特性。

首先是趋光性。涨潮之后，蟹群被海堤上的明亮路灯吸引，从四处聚集过来，也许光线均匀，对其并不构成生理威胁。此刻，捞蟹人只要对准个头最大那厮，打上手电强光，螃蟹立即呆愣在半途，候在一旁的网兜，轻而易举将其提拉上岸，成为战利品。其次见识了横行的蟹路，十爪并举的霸道傻样，在清澈的海水里一目了然。原来，识别出螃蟹虚张声势的本性，将其一网打尽并非难事。

海捞凯旋，接下来就该显摆厨艺。说实话，几十年的品蟹体验告诉我，将其隔水清蒸，是保持其原味的最佳选择。那些费尽周折捣饬出来的饕餮料理，属于商家的赢利计谋和文人的画蛇添足。首先，将煮熟的蟹黄蟹肉人工剔出，无论直接装盘上桌，还是再次下锅加工，平添食品污染与丧失海鲜原味的概率。唯一的好处，是替偶尔尝鲜、舌尖笨拙的内陆食客避免了席间尴尬，否则被胡乱咀嚼一通，真是暴殄天物。最要紧的是，切不可将时令的柿子，与蟹黄同时摆上宴席，二者同时食入，性命交关。个中病理学机制，现代医学至今难以道明。

预热过的糯米黄酒，加上姜丝，是佐蟹的绝美搭配，二者有助祛除初秋的湿凉。这些算不上独家秘笈的食蟹细节，来自 1976 年金秋的街坊邻居，大伙儿终于等来拨乱反正，以致我们这拨半大小子，有样学样掰螃蟹，三雄一雌饱口福。从横行霸道的螃蟹里品味世态冷暖，是近半个世纪前刚刚达成的时令习俗，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难忘。

难忘的书与人

肖沃：外科医生的童心和悲悯之心

汪家明

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偶尔见到利奥波德·肖沃（Léopold Chauveau）作品的法国图书馆馆员米歇尔·柯歇，想尽办法出版了他的三部儿童作品；不久，日本童书出版社福音馆引进了它们；2005 年，动画导演山村浩二把其中的《孤独的老鳄鱼的一生》制作成动画片并获国际大奖；2010 年，一直迷恋肖沃作品的米歇尔·柯歇筹措资金举办了“肖沃艺术大展”；2020 年 6 月，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里，多家艺术媒体发布了一条新闻：“巴黎七区的奥赛美术馆将于 23 日重新开放，届时将安排两项展览，一是法国画家詹姆斯·迪索的作品展，一是法国雕塑家利奥波德·肖沃的艺术展，两场展览都将持续到 9 月 13 日。所有 11 岁以上的参观者必须佩戴口罩。”“肖沃展将包括 18 件雕塑和 100 件画作，重现了这位几乎消失在历史暗影中的外科医生、艺术家的奇幻世界。”又过了一年多，疫情尚未过去，一套上下两册的中文版《肖沃奇怪故事集》出版了。此时，距肖沃去世已过了足足八十一年。

一位外科医生如何成为了不起的画家、雕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

1870 年 2 月，利奥波德·肖沃生于法国里昂，他的父亲奥古斯特·肖沃曾是著名的里昂兽医学校校长，还参与创建了里昂医学院。里昂兽医学校是世界第一所兽医学校，创办于 1761 年。奥古斯特去世后，兽医学校为他建了纪念碑，至今耸立在这所名校里。利奥波德并不喜欢医学，他喜欢文艺，创作了不少作品，有小说、水彩画和雕塑，但在强势的父亲逼迫下进了医学院，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对未化脓慢性耳黏膜发炎病人进行中耳鼓室手术治疗耳聋的研究》。毕业后他在好几个城市行过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召入伍。战后他写了一本《战争背后》，如实记录了他在战争期间所见所闻以及作为战地医生所做的各种困难的手术，包括受伤士兵或军官的真实名姓。

除了一战那几年，肖沃的生活本是庸常的、平静的，行医收入稳定，妻子出身于外交官家庭，为他生了四个可爱的儿子。可是，连续三起家庭灾难毁了他的生活：先是 1915 年 9 月，十六岁的大儿子在海边度假时溺水而死，不知是意外还是自杀；三年后妻子因抑郁成疾而亡；又过了四个月，他亲手为最喜欢的儿子、刚满十二岁的鲁诺做一个小手术，却不幸让儿子感染了败血症而夭折。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已经过去，杀戮、流血已成为往事……可我却在这时失去了三个亲人！而且，让我永远无法得到安慰的是，他们都死于非命，死得毫无意义……”

世界大战和家庭灾难给肖沃带来双重心理创伤，难以解脱，他整日惶惶不安，甚至“对自己的手缺乏信心”，最终只好彻底放弃了奋斗大半辈子的外科手术事业，转而到艺术和文学中寻找疗愈心灵阴影的良方。这也许是冥冥中上天的旨意：世界上减少一位循规蹈矩的外科医师，多出一位我行我素的艺术家。

小儿子鲁诺活着时候，总缠着他，要他讲故事。他不耐烦复述那些人人皆知的经典童话，但被缠不过，就自己“瞎编”。他发现自己瞎编的故事儿子很喜欢听，就很来劲。比如他瞎编说，蛇本来是有四条腿的，和别的动物一样，后来因为跑路太多被磨掉了；比如他说乌龟本来是跑得最快的动物，可是后来得罪了兔子，兔子求乌鸦帮忙报复，乌鸦用世界上最粘的糨糊把乌龟的房子粘在它身上，从此无法分开；比如恶意捣蛋的锯子鲨、锤子鲨和本性难移的食人鬼……

当然也有时候——很少——他的故事吸引不了鲁诺，鲁诺精神不集中了、犯困了，他就立马给故事情节来个惊人的转变，比如故事主角突然死了，跌下山去了、被吃掉了等等。鲁诺立刻紧张起来，精神起来，又瞪大了眼睛——反正是瞎编，过后如果有需要，再让主角活过来就是了。像《一次能吃三个小孩的大树》，很恐怖，可是最后伐木工砍开了大树的树干，“树干里面的空洞，是大树的胃。树干断开来，露出了所有被吃掉的小孩儿。小孩儿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只剩小指的一半那么大了。他们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大树消化掉，剩下这一点儿是大树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这些小不点儿被伐木人装在裤兜里带回村庄后，吃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恢复了原大……

肖沃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诞生了，都是很奇怪、匪夷所思的故事，它们专注于虚构的生活场景，表面上没有崇高或对错之分，但其中凸显出率真和稚拙，充满了浓浓的生趣和隐隐的哲理，故事完了，又似乎没完。

其实，每次讲故事，他都是先写下来，念给鲁诺听的，有些现场的随机改动，过后也没加进去。放弃外科医生职业后，他一遍一遍回忆给儿子讲故事时的情景，努力把故事写得更完美，然后配上插图。起初，插图是请他的画家朋友皮埃尔·博纳尔（Pierre Bonnard）等人绘制的，多是钢笔水彩画。后来他试着自己用黑墨水笔手绘，以细密的线条来刻画形象，酷似木刻或铜版，有一种先天的单纯和放松。也许刀和笔原本就有着某种联系？不是吗，外科手术用的是刀，木刻和铜版也是用刀，古代版书和碑文也是用刀刻出来的——这只是从用具方面比附，其实从精神层面，外科医生与画家、作家也许更接近，比如，都需要精微的刀（笔）法，都需要一颗悲悯之心。

他一面画，一面想念着鲁诺，恍如鲁诺倚在他膝下，仍在听他讲故事，眼睛瞪得很大。他的画笔，如有神助，一笔一笔，一幅一幅，竟然为十五个故事画了将近三百幅插画！

在图文并茂的故事书的最前面，他写下“纪念鲁诺·肖沃”的字样。这是对儿子最好的纪念。“他写给小鲁诺的儿童故事犹如父子在九泉之下的对话，对父亲来说不啻是一种解脱的方法，同时也能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存在下去。”

肖沃生活的年代，正是后印象派画家活跃的年代，出现了塞尚、高更、凡高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画家，肖沃与他们相识，参加各种艺术沙龙，尤其和雕塑家、画家乔治·拉孔、作家马丁·杜·加尔（以《蒂博一家》获得 193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密友。

相比之下，肖沃的雕塑作品也许更为别致，创作时间跨度也很长，从一战前就开始了。都是些想象出来的怪物塑像：猫面企鹅、长鳍的松鼠、脑袋怪异的鱼儿、猴身猛禽，或者完全说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形象，表达的却都是人的情感：孤独、失落、冷漠、发自内心的呼喊……有评论认为，“在这一长串令人心情郁闷的东西中散发着某种不安的氛围”。这也许就是肖沃内心的写照，移情到一个个莫名的小雕像之上，他的心灵阴影借此得到些许化解。“在这里，一切痛苦都被转化，在浑圆奇异的生命形态中，人性的善被一种粗糙的朴实代替，而无法逃离的恶却被慈悲地谅解。”

二战中，肖沃和红十字会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接待中心，为的是大批比利时和法国的难民途经此地时有个地方住宿，并得到起码的照料。难民如潮涌而来。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眠不休，再加上每天接触到令人揪心的惨像，使他的精神和体力都严重透支。他是突然去世的——1940 年 6 月 17 日，正是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前后。他被安葬于当地的公墓。战后，马丁·杜·加尔自己出钱，给他安了一块墓碑，可后来坟墓竟不见了。

肖沃是被埋没的天才，他的艺术作品的传播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隔断，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法国人才重新发现了他。马丁·杜·加尔说：“肖沃在艺术这个朦胧暧昧、复杂多变、取之不竭的领域里来去自如，从现实发轫，最终陷于虚构。他既着重具体的形象，却又天生执迷于奇思异想……在他那里，只有陷入奇思异想，甚至于陷入令人恐惧的想象之中，才能真正将他个人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

巴黎七区奥赛美术馆的肖沃艺术展早已撤展，而肖沃艺术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行程才刚刚开始。